
第三届近百年中日关系研讨会综述

陶文钊

第三届近百年中日关系研讨会于1995年1月12日至15日在台北近代史所举行。研讨会由近史所所长陈三井主持。中研院院长李远哲出席开幕式并作讲话,第三届研讨会的主要推动者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教授吴天威、香港慕光英文书院校长杜学魁等也在开幕式上致词。出席会议学者130余人,其中中国大陆15人,美国7人,日本11人,港澳3人。提交会议的论文共36篇。两次中日战争是研讨会的中心议题。

一 关于中日甲午战争

关于中日甲午战争的论文共7篇。张振鹞(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在题为《中日甲午战争与东亚》的论文中指出,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间的战争,但又超出两国的范围,事实上是一场东亚地区性战争。从战争的发生看,自1876年日本打开朝鲜,80年代美欧列强相继进入朝鲜,朝鲜渐渐成为东亚国际矛盾斗争的集中点;日本必欲夺取朝鲜、割断已有二百多年历史的中朝宗藩关系,使中日矛盾成为各种国际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日本终于在朝鲜蓄意制造了这场战争。就其性质来说,这是一场侵略朝鲜和侵略中国并举的战争,日本由此完成了“脱亚入欧”。战争的一个后果是引来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大争夺,中国遭遇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东洋之波兰”的命运如千钧之系于一发。吕实强(台北近代史所)认为,甲午战争后中华民族的危机确实很严重,但说中国的命运“如千钧之系

于一发”则说重了。

杨惠萍(大连大学师范学院)的论文《中日两国政体与甲午战争之结局》认为,甲午战争中“东瀛蕞尔”之日本之所以获胜,泱泱大国之清王朝所以败北,关键在于两国的政治体制不同。日本的资产阶级立宪政体整军经武,全力以赴从事侵华战争,最后获胜;清政府统治集团内部分化,政出多门,军事指挥混乱,和战争论不休,结果败北。张玉法(台北近代史所)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不能说甲午战争是君主立宪制打败了君主专制制,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不是政治体制,而是与战争有关的诸多因素:综合国力、战略战术、武器装备乃至情报的获得。讲到和与战的问题,龚书铎(北京师范大学)的论文《中日甲午战争的和战问题》提出:当时和事后许多人把战争失败归咎于翁同龢和主战是不实之词。在甲午战争中,主战无可厚非,主和派寄希望于列强干预,妥协求和,不积极备战,以致贻误战机;加之清政府政治腐败,军无斗志,才导致战争失败。陈在俊(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编辑委员会)认为,对主战主和要作具体分析,凡是日本侵略,不论被侵略者主战主和,日本都要达到侵略目的才罢休。在八国联军时主战主和就有大区别了。刘申宁(深圳社会发展研究所)指出,不能简单地用主战主和来分析战争失败的原因。主战派多半是言官,清政府出于对淮系、湘系等地方实力派的担心,在朝中设了这些言官以为牵制。但这些言官的许多认识与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很隔膜的,如有人竟称可以“围魏救赵”,打到日本本土去。淮军固然腐败,但当时腐败现象是普遍存在的。而淮军装备较好,陆战中能够真正打一下的将领,如左宝贵、聂士成都是淮军的。

林子侯(台湾嘉义大同商专)在《乙未中日马关条约之再检视》的论文中指出,李鸿章外交最大的失策是过分依恃俄国,最后只好接受美国偏袒日本的调停。李鸿章赴日议和,处处遵照清廷训示,而非独断专行,割让台湾是清廷的决定,他最大的失策是几乎没有抗争就接受了第六款(开埠设厂)。他不懂得利用遭到袭击来改善

和谈中的地位,表明他不是一个老练的外交家。林子侯还说,李鸿章在谈判中故意把割让辽东向列强透露,引起三国干涉,导致中国赎回辽东。梁华璜(台湾成功大学历史系)指出,日本对台湾是志在必得,明治天皇本人对台湾就极重视;日本提出条约第六款第四条也是为英国人美国人着想的,这可以减少条约的阻力。李国祁(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也认为,外人在华设厂是英国人不反对条约的一个条件,日本还承诺把台湾海峡作为国际水道。张富强(广东省社科院)在《日本军国主义与三国干涉还辽》论文中论述道:对于割让辽东一事,俄国早有预测,并非李鸿章透露消息才引起列强干涉。这是当时列强错综复杂关系的产物:法俄有同盟关系,德国有意把沙俄引向东方,美国虽试图利用日本牵制沙俄南下,也不愿加剧与沙俄的对立,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只好暂时妥协。

余绳武(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论文题为《从〈字林西报〉看英商对中日甲午战争的反应》。他指出:英商担心战争使俄国渔人得利,而使英商利益受损,主张中日两国通过和平途径解决争端。战争初期,他们暂时静观,平壤、黄海两战后,该报开始热烈赞扬日军胜利,但又担心战争旷日持久,可能导致清王朝覆灭,因此希望早日结束战争。该报对日本割让台湾一度表示不满,担心这可能影响香港与上海之间的交通,但对割让辽东则毫无意见。英商对《马关条约》总的说来是相当满意的。张朋园(台北近代史所)认为,总的说来,英国政府与英商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有时也有矛盾,因为商人总是比较着眼于眼前的短期的利益,一旦遇有矛盾,商人总是不顾政府的利益,而力图维护自己的利益。《字林西报》也有些道德感的表现,如1932年它就谴责日本轰炸上海。

关捷(东北民族学院)在《一部有价值的史证》一文中,对龟井兹明的日记“日清战争从军写真帖”作了介绍。龟井是当时的随军摄影师,其日记分七章,记载了从1894年10月出发到1895年5月30日的见闻,内容比较客观、准确,尤其是书中的210幅照片和3幅插图具有较高史料价值。自然日记有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对

日军的褒,对清军的贬极为鲜明,有的记载只是耳闻,使用时需要慎重。

二 关于抗日战争

关于抗日战争论文共 12 篇。方庆秋(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在《九·一八前后的中日关系》论文中指出,“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本人也觉得,以天理人心推之,应先对付日本而后中共,但结果还是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方针。南京政府为解决财政危机,利用英、美、日矛盾,实行币制改革,日本为逼迫国民政府向日一边倒,极力破坏币制改革,结果却把蒋逼上梁山,使之逐步走上联苏容共抗日的道路。陈在俊的论文题为《中日两国全面战争的导火线:卢沟桥、廊坊、广安门事件的探讨》,他具体研究了七七事变发展的经过情形,对一些细节作了详尽考证。

日本学者伊原泽周(追手门学院大学文学部)在题为《大东亚共荣圈论的成立及其构想》的论文中,对日本“大东亚共荣圈论”的历史背景、构想和实质内容进行了研究,指出,“大东亚共荣圈”乃是所谓“皇道”与军国主义的结合,“皇道”即皇国的使命,所谓八紘一字,建立日本对东亚的殖民统治,军国主义则是手段。要实现这一目的,便要把英、美、荷从亚洲赶出去,也就必然导致太平洋战争。他强调说:现今政府阁僚中,有少数人仍不知反省,公开发言表示,“大东亚战争”是非侵略性的战争,“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是合理的。有人甚至主张修改和平宪法,企图建立军事大国,这是亚洲人民也是日本爱好和平人民所不允许的。有的亲身经历了日本侵略痛苦岁月的学者指出,根据当时日本的宣传和实践,“大东亚共荣圈”的主要内容是“亲善、防共、建设东亚新秩序”三条。

孙宅巍(江苏省社科院)的论文题为《论南京大屠杀的背景、范畴和原因》。他提出,南京大屠杀的时间应该是从 1937 年 12 月 13 日到 1938 年 2、3 月间,地区除南京的 12 个行政区外,还应包括邻

近的县。他说：在南京这样多中国军人被杀，唐生智是有责任的，唐生智既没有组织有效抵抗，又没有组织有秩序的撤退。他先确定“大部突围，一部渡江”的方针，但撤退时，又临时规定“大部过江，一部突围”，结果大批部队（约9万人）滞留江边与城内，退不能退，打不能打，成为日军俘虏。这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是独一无二的。李恩涵（台北近代史所）认为，南京大屠杀的时间还是算到2月上旬为妥，一共八九个星期；唐生智虽有过失，但他指挥保卫南京，还是功大于过。

李恩涵在《日军对晋东南、冀南、鲁西的‘三光作战’（1937—1945）》的论文中说，“三光作战”是根据日军对中共地区大规模扫荡战中残酷屠杀与破坏的事实，予以概括描述的一个名词，日文中的“烬灭作战”就是烧尽灭绝、烧光、杀光的意思，与“三光作战”意义完全相同。有人因为日军没有用“三光”这个词而否定“三光作战”是站不住脚的。现在，研究中日战争的许多日本学者、美国学者对“三光作战”也无疑义了。“三光作战”实施的地区与范围，特别是针对华北我军（包括国军与中共军）游击区的。如果日本不能忘记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那末它更应该牢记“三光作战”的罪行。

刘凤翰（台北近代史所）在题为《日本侵华部队之分析研究（1945.7—1945.9）》的文章中对抗战末期侵华日军的“师团、独立混成旅团、独立步兵旅团、独立警备队系统及各地的军队人数作了考订。

张存武（台北近代史所）的论文《菲律宾华侨的抗日活动》热情赞颂了菲律宾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功绩：他们组织抗日团体，抵制日货，提供财经援助，甚至回国参战，并组织抗日游击队配合美军作战。菲律宾人民抗日军华侨支队以中共有关抗战、游击战的著作为教材，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组织菲军，有效地提高了战斗力。

唐德刚（美国纽约市立大学）的《战时日本对中国诱和活动的第一阶段》一文，对抗战初期与日本秘密接触的重要人物高宗武作了再考察。他对高进行过多次采访，并准备撰写专著。他说与一般

人们常说的在抗战期间蒋介石不断秘密向日本求和以结束中日冲突相反,事实是,日本不断地以各种各样的(苛刻的或温和的)条件向蒋介石诱和,这是因为日本原不打算在中国持久作战,他们希望能象甲午战争、九一八事变那样迅速解决问题。

谭汝谦(美国马卡莱斯特学院)在《“亚洲人的亚洲”:日本占领期间对香港的文化控制,1941—1945》的论文中说,日本力图肃清美国留下的西方文化的影响,对歌坛、粤剧、电影实行监管,对香港人民的宗教信仰(基督教、天主教、佛教)实行控制。但日本“亚洲人的亚洲”这个口号欺骗不了人民,由于军国主义者内部的矛盾及香港广大居民的抵制,日本的文化控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吕实强作为战争的过来人,在《民国二十年代中国歌曲中所表现的抗日精神》一文中指出,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中国歌曲充满了和平、恬静的情调;日军的入侵,使中华民族同仇敌忾,不惜以血肉筑成新的长城,抗日的歌曲唱出了民族的浩然正气。

吴天威在《中国与二次大战的结束》一文中强调指出,中国人民在抗战中遭受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也为最终战胜日本作出了重大贡献。美国史密斯博物馆正在筹备结束二战的纪念,在这个展览中应当给中国抗战以应有的地位,给一个历史的公道。

傅佛果(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在《战时中国的日本旅行者》一文中研究了当时访问中国的日本教育工作者,新闻从业人员等的访华记载,发现他们都隐约表现了对政府侵略政策的不满。熊秉真(台北近代史所)则指出,他们的报道除极少数者外,绝大多数流于形式,甚至呼喊“满洲国”万岁的口号,这未尝不是日本知识阶层政治意识及自我形象的一部分。

三 其他问题

1. 关于经济关系。

陈慈玉(台北近代史所)在《中日战争期间日本对山东煤矿的

统制》一文中分析说,日本矿产资源贫乏,进入 20 年代,国内主要煤田已过鼎盛期,而进口煤主要依赖中国。开战以后,日本政府、军方和财阀进一步掌握了华北煤矿资源圈,山东是其中重要一环,山东煤产量中相当大一部分是输出到伪满和日本的。刘申宁指出,在山东各煤矿中,枣庄煤矿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因为那里煤质优良。林满红(台北近代史所)在《台湾与东北间的贸易(1932—1941)》的长篇论文中对论题作了详尽考察,指出,日本要巩固在东北的统治就要从经济上尽可能斩断东北与关内的联系,于是大力推动台湾与东北的贸易,实现两地之间交通运输的一体化。日本这样做,从政治上来说是要把台商的利益与日本的利益结合在一起,制造往后台湾人与中国大陆认同的困难。使大陆的中国人同仇敌忾的事件,如“九一八”、“七七”,对于发展台湾与东北的贸易却是极有利的,由于商贸利益的扩张,台湾人从上层绅商到山野村民都得到好处。对于这一历史事实,毋庸回避。李国祁指出,日本对东北、台湾的统治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切断这两地与中国大陆的联系,而把它们包容在日本的经济体系之中。与会者还提到,要研究经贸活动对思想文化的影响。中村义(日本二松学舍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部)的论文《赴清实业团研究》对 1910 年 5 月至 7 月日本六城市商会及经济界代表赴清实业团进行了具体考察。

2. 关于文化关系。

细野浩二(早稻田大学文学部)在《帝国主义与“大同”之间的康有为》一文中研究了日本对康有为思想的影响,指出:康有为既有作为“世界主义”的“大同”构想,也有根据戊戌变法的“全变”而创造出来的“霸国”的“中华国”。康有为的“大地大同论”是在樽井藤吉的《大东合邦新义》和李提摩太的《四国合邦》的构想的激发下产生的。吴雁南(贵州师范大学)在题为《维新志士的对日观与社会文化心态——兼论戊戌维新期间的联日思潮》的文章中论述说:学习日本,拜日本为师,联日御侮,变法维新成为维新志士对日观的核心内容。从当时的社会心态看,人们认为中国条件远比明治前的

日本优越,只要借鉴日本,即可创造奇迹。有的论者以为维新志士“联日”主张是日本侵华阴谋活动的结果,其实不然。这里既有列强之间的矛盾促使人们寻求与国的主张,也有以古代合纵连横比附列强同中华民族矛盾的现象。王树槐(台北近代史所)认为:讲当时维新志士的联日思潮,必须讲清他们是如何在心理上克服对日本的仇恨心态的。实际上,他们许多人认为甲午战争中中国遭受奇耻大辱,是由于中国贫弱腐败,咎由自取。他们的联日,也有传统以夷制夷的策略在内,但实际上由于清政府对于列强“一视同仁”,“利益均沾”,以夷制夷也不可能发生什么作用。小岛淑男(日本大学经济学部)的论文题为《清末民国初期中国留日医学、药学生的动向》,这是以前还很少有人注意的论题。

3. 关于日本侵华政策、思想与实践。

水野明(日本爱知学院大学教养部)在《日本的“中国非国论”的检证》一文中指出,在战前一些东洋史权威如矢野仁一、内藤湖南、稻叶岩吉等提出了“中国非国论”,认为“中国不能算是一个国家,中国“顽迷愚昧”,“满蒙管理……是日本的神圣的十字军事业”等等,所有这些荒谬说法,成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理论根据。现在仍有人美化侵略战争,说“败战为终战”,“终战为和平”,“和平为胜利”,这完全是篡改历史,日本应从中日战争的教训中猛省。

刘恩格(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历史系)在《甲午战争—辛亥革命期间日本对华政策的演变》一文中指出,在侵略目标上是从侵吞朝鲜、蚕食东北、开放长江,进而独占满蒙,兼顾其他;在手段上,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讹诈为辅,军事、政治手段交替使用,向以政治压迫为主,军事威胁为辅演变。

易显石(辽宁大学日本所)以《东北地区在近代中日关系中的历史地位》为题论述说,日本政府视东北地区为“非中国”的特殊地区,这是明治政府确定的基本国策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论文以大量史实,驳斥了“由于日本民族致力于满洲的近代化,使满洲的经济文化建设获得成功”的谬论。

本元(日本法政大学法学部)论文《福州事件与中日交涉——1916—1928年北京外交部之角色》对1916年由于日侨袭击推动抵制日货运动的中国学生而演变成的福州事件的解决过程进行了考察,认为这是北京政府一次成功的交涉。张治雄(台北近代史所)指出,对此事件的研究要充分注意到“五四”前后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这是交涉成功的根本原因。

4. 美国与中日关系。

朱永德(美国罗切斯特理工学院历史系)在《美国在近世中日关系中扮演的角色》一文中指出,美国在20世纪上半叶中日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处在监督日本,抵制日本的地位上,而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对中国有利的。自然美国借门户开放政策来抵制日本,决非出自对中国的特别同情和偏爱,而是与其自身利益不可分割的。陶文钊(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的论文《日美在中国东北的争夺(1905—1910)》,具体剖析了日俄战争以后到辛亥革命之前这六年中日美在东北的三次较量(哈里曼铁路计划、新法铁路计划和东三省开发贷款、诺克思满洲铁路中立化计划),指出美国之所以节节败退,主要有四个原因:一、国际形势对日本有利,美、法乃至俄国都站在日本一边;二、美国为了确保菲律宾的安全,宁可在东三省对日本让步;三、美国的退让服从于调整因排斥日本移民问题而变得紧张的美日关系的整体需要;四、多数美国决策者(包括西奥多·罗斯福)和政策执行者都认为不能因在东北的门户开放问题而与日本迎头相撞。李毓澍(台北近代史所)同意论文的分析,但认为对于此后直到华盛顿会议的日美关系应有所提及。

5. 人物研究。

刘申宁和翁飞(安徽省社科院)分别研究了甲午战争前后的李鸿章。刘申宁在题为《李鸿章的对日观与晚清海防战略》的论文中认为:李鸿章从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崛起中,既看到国家的发展方向,又感受到日本对中国的巨大威胁,他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加强海防的战略方针,为中国由一个陆国走向海洋提出了明确的奋斗目标

标。但清政府选择塞防作为战略重点,虽然后来决定两者并重,实际是东缓西急,这种战略重点选择的错误,表面上看失去的是十年的时间和足够再建三支北洋海军的经费,实际上丢失的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机遇。李恩涵不同意重视塞防是一种错误选择的观点,认为塞防的成功应予以充分肯定;海防经费紧张,塞防经费同样不宽裕,左宗棠筹集粮饷是很困难的。翁飞在《马关议和后李鸿章的思想嬗变及对国策之影响》的论文中指出,李鸿章马关议和,可谓众怨沸腾,连家里人都反对他,但他认为自己是代人受过。马关议和给李鸿章的刺激极其强烈,促发了李鸿章的思想嬗变,使他的洋务一变法思想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他在一段时间失势闲居后,很快从消沉委顿中振作起来,勇敢走出国门,认识世界,为清政府的外交政策带来重大调整。同时李鸿章也认为君主制向民主制过渡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他的改革思想间接地影响了光绪。李国祁认为,马关议和中,李鸿章原以为割让辽东俄国不会坐视,这被应验了;他还以为割让台湾英国不会坐视,这没有发生。和议后,光绪对李深恶痛绝,不会再受他的影响。李从1870年起就对俄国有好感,是主张联俄的第一人。

山田辰雄(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法学部)在《桔朴与中国国民革命》论文中,对长期驻在中国的著名新闻记者桔朴从20年代到40年代的思想演变的复杂过程作了剖析,指出:在20年代,桔朴非常期望被认为真正继承孙中山思想的国民党左派能取得革命的领导权,但左派缺少为指导革命所必备的组织、军事的基础,统一战线也没有成功。经过这次挫折,他又一心想在“满洲国”的建国过程中,寻求所谓中国的变革与中日两国之间相互依存的可能性。

久保田文次对萱野长知作了研究,认为他与宫崎滔天一样,是与孙中山思想上共鸣、诚心支持革命的“自由民权派”大陆浪人的一个代表。他从小求学于自由民权派学校,醉心于自由民权思想。他从各个角度支援中国的革命运动。中日战争初起,他仍以尽快中止两国武装冲突为念,参加有关和平工作。

6. 中日关系的现状与展望。

许介麟(台湾大学日本综合研究中心)对战后半个世纪中日关系的变化作了概略的回顾。杜学魁谈到研讨会在今后中日关系的意义时说:我们研究过去的中日关系,揭露日本的侵略罪行,只是为了求取历史的公道,如果历史不能摆平,那么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们这些受过战争苦难的人,从感性中得出一个理性,如果这种理性不能实现,还会回复到感性。好朋友清算帐,前边的帐算不清楚,后边的帐也会一塌糊涂。

薛君度(美国黄兴基金会董事长)指出,历史上没有一个经济大国不变成军事大国的,军事大国不一定侵略别国。现在日本不但军力雄厚,而且开始派兵出国,还一度认真考虑制造原子弹,军国主义复活向外侵略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日本和德国都是战败后复兴的国家,但对战争责任的态度却不相同,德国承担责任,一再公开道歉;日本却还有政府大员否认侵略中国与南京大屠杀。对此应予以警惕。他同时强调现在地缘经济已取代地缘政治成为两国及周边关系的主导因素,局势相当稳定,估计在不久的将来,如果没有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中日关系是不会恶化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